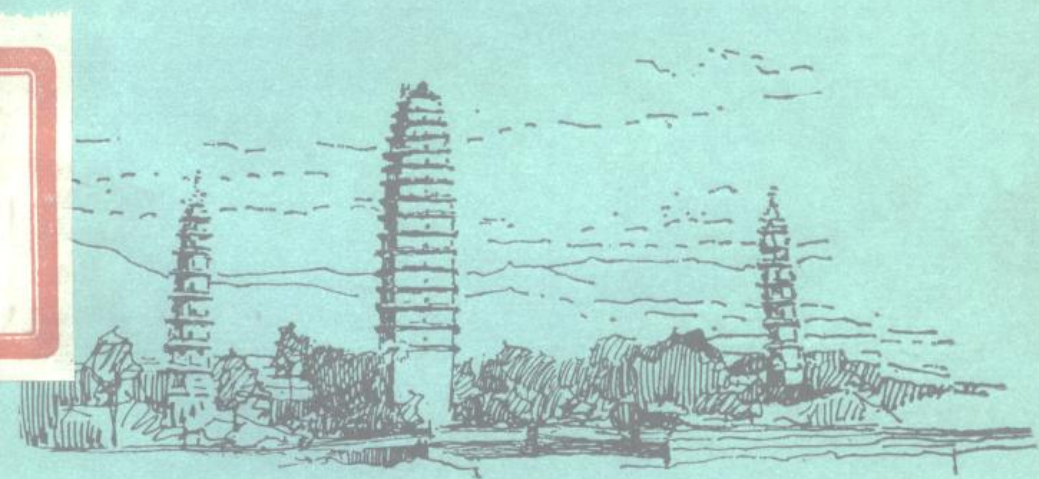


探索 泰族的历史

素察·蒲媚波里叻著 陈健民译



探索泰族的历史

〔泰〕素察·蒲媚波里叻著

陈健民译

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马少展

根据泰国为人生作品出版社1982年版译出

探索泰族的历史

TANSUO TAIZU DE LISHI

〔泰〕素察·蒲媚波里叻著

陈健民译

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.75印张 54,000字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,500

书号 11001·653 定价 0.40元

(内部发行)

译者说明

《探索泰族的历史》一书，是泰国为人生作品出版社1982年6月在曼谷用泰文出版的。

此书原有八篇文章，这次译成中文出版时选译了其中五篇，即：《南诏是我们泰族的国家吗？》、《实地考察南诏的历史》、《南诏的“诏”是什么意思》、《孟获不是泰人》、《诸葛亮（孔明）不姓“诸葛”》等，还译出了素瓦·哇拉里洛为此书所写的序言，《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人》。原书另外三篇文章：《中国西南部的各个部族》、《西双版纳简史》和《傣泐命名的习惯》，因为并不涉及中泰两国的历史关系，所以中译本未收入。

原书作者素察·蒲媚波里叻是泰国进步新闻工作者。他经过两次实地考察和对历史文献及地下文物进行比勘研究以后，令人信服地指出，在唐朝时期建立于中国西南部的南诏国，并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，而是由中国少数民族彝族和白族的先民——乌蛮和白蛮在今云南省建立的地方政权。

此书对澄清在泰族古代史上的某些错误认识，对增强中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互相了解有积极意义。

目 录

序言：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人·····	素瓦·哇拉里洛 1
一、南诏是我们泰族的国家吗？·····	7
二、实地考察南诏的历史·····	32
三、南诏的“诏”是什么意思·····	62
四、孟获不是泰人·····	67
五、诸葛亮(孔明)不姓“诸葛”·····	78

序 言:

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人

素瓦·哇拉里洛

素察·蒲媚波里叻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是陌生的,但在三十多年前,泰国知识界的许多人都认识他。那时他不只是一位爱好正义的新闻工作者,而且还由于公开参加反对泰国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追随美国的政策,在“和平叛乱”一案中,以“在国内外进行叛乱”的罪名而被逮捕。

1952年,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、作家、大学生、知识分子、工人和农民,为了响应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成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发出的,关于保卫世界和平、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谴责发动侵略的国家的号召,成立了“泰国和平委员会”,并且增加了反对按照美国的旨意,把泰国的士兵派到朝鲜战场去作战这样的内容。

“泰国和平委员会”在群众中进行的活动,除了在全国征集和平爱好者的签名外,还到东北的干旱地区,向那里的人民分发御寒物资,因为那一年特别寒冷,而政府却未及时进行救济。这就引起当时政府首脑(总理是波·披汶颂堪元帅)的恼

怒，因而对“泰国和平委员会”的成员和有关人士进行逮捕，把这些人的活动同因发起“孟哈顿叛乱”事件^①而于1951年被捕的一些海军官兵联系起来，尽管被捕的这两起案件的人员，大部分素不相识，互不往来。

素察·蒲媚波里叻也在被捕之列。

当时，素察在《荣誉报》社工作，恰巧同那位手提机关枪，把波·披汶颂堪元帅劫持到“阿瑜陀耶光华号”战舰上的海军少校玛纳·乍鲁帕是要好的朋友。在政府军队同这群水兵发生武装冲突之后，水兵失败了。素察作为玛纳·乍鲁帕海军少校忠实的朋友，带他逃离泰国。

他俩隐匿在缅甸，打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，但由于玛纳·乍鲁帕舍不得自己的妻儿，于是两人又都潜回泰国并一齐被捕。

法庭判处“孟哈顿”及“和平”两叛乱案的人员以若干年有期徒刑，他们在挽匡监狱里被监禁了不到五年的时间，波·披汶颂堪元帅政权便趁“半个佛劫期”^②大事布施之机，对这两起案件的全部人员实行大赦。

素察出狱后再次从事新闻工作，一年余之后，由于中国政府邀请泰国新闻工作者到大陆访问，他也随团前往。该团的团长是古腊·赛巴立。

(1957年9月16日)革命团首领沙立·他纳叻元帅在1958年10月20日对他依政府实行革命，即“自我革命”，然后废除宪法，解散国会和所有政党，成立新的宪法起草委员会，实行完完全全的独裁统治。在这个时期到社会主义国家去访问的泰人，回国后一律被加上“共产党”的罪名而被捕。

到中国去访问的泰国新闻工作者大部分回国蹲监狱，少数人要求政治避难而在中国长期居留，素察同古腊·赛巴立和其他个别因员，就是这样在中国留下来的。

素察利用在中国居留的空闲时间，到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学习。但到了第三年，由于北京的外文出版社需要素察的知识和才能，因此他便中断了学习，到外文出版社工作直到现在。

素察是一位勤奋好学的知识分子，他主要通过自学进行学习和研究，尤其是在语言方面，因此，毫无疑问，目前他已成为中国政府精通泰、中、英三国文字的专家。

在中国大陆，素察同另一位在北京大学^⑤生物系学习的泰国人认识，在她毕业之后，他们俩就结为终身伴侣，她的名字叫西甘达·蒲媚波里叻。

素察同古腊·赛巴立一样，被誉为分析泰国社会局势的专家。因此，尽管(泰国)人民在1973年10月14日起来要求颁布宪法并把独裁者驱逐出境，泰中两国又在1975年首次建立了外交关系，但他仍然不敢下决心回国，尽管他有着回国的强烈愿望。

他的预见丝毫不差，当1976年10月6日在法政大学发生流血事件之后，民主制度仅存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，便又一次被窒息了。改良派的政府，尽管有着文官的首脑，但却给泰国造成了历史上第一个“文官独裁”的政府，她废除了宪法，重新起草，并解散了国会。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，因为这是在(泰国)人民已经从1973年的“10·14”事件中尝到了民主的甜头之后发生的，因此在1977年3月26日发生了不平常的

事件，即在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的情况下，便把一位军队的高级军官处以极刑。而该文官独裁政府对人民权力的藐视和挑衅的结果，是在1977年10月20日再次被陆军所推翻，江萨·差玛南上将出任总理，推行民主制度，于1979年实行全国大选。那时的民主气氛一直维持到现在，尽管还不很完善，但总比没有好。

即使如此，已经决心要回到自己家园的素察·蒲媚波里叻，还由于当局某些条件的障碍而未能成行。在他等待回国的这段时间里，为了表达他内心的强烈爱国感情，就先把他研究泰族历史由来的这本书，代表他本人寄回国内。

我们从来就被教知说，泰族是从中国大陆迁移来的。我们还深信不疑，曾经被四川的统帅孔明打败，数次被擒但仍不肯屈服的勇猛番将孟获是泰人的祖先；就连于阁罗凤时代在中国南部盛极一时的南诏国，也被说成是泰人先民的国家，而这已被现代的一些历史学界所完全否认。

一般的历史学家，从过去别人所写的著作中，包括从那些稗史和民间传说中进行研究，加上历史学家本人的主观臆测，于是有时把历史描述得简直有如幻想中的神话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许多读者深信不疑，这是由于作者和读者的思想水平和思想方法所决定的。

更重要的是，大部分的历史学家，从未亲自到历史发生的地点去进行调查研究，而是喜欢坐在家里冥思苦想以往的历史事件。因此只有具有科学思想方法的历史学家，才肯有时要不惜花钱和冒险，奔赴研究的目的地去实地考察历史的文物，在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之后，才得出自己最后的结论，

这才是对学习历史的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人负责的态度。

素察·蒲媚波里叻就是属于这后一种人。虽然他在这本书中所写的内容和观点，同泰国传统的书籍和人们的种种定见有矛盾，也应该予以赞扬，并可供人们考虑和研究，以便把泰族的由来问题弄个一清二楚。

在宗教方面，泰人长期以来受到佛教唯心主义的影响，后来当菩提拓和班雅南塔两位大师对佛教加以科学的解释之后，泰国的知识界才耳目一新，认识到佛教的实质是为了给社会带来安宁，而不是象唯心主义所讲的那样，是为了帮助人们升入天堂。

在历史方面也一样，在研究了南诏的问题之后得出结论说，泰人早就在现在(泰国)的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，而不是从别处迁移来的，这种观点，不止是素察一个人所持有，其他尊重事实和对历史进行科学分析的历史学家也还是有的，只不过是现在在这些人当中又增加了一个素察·蒲媚波里叻罢了。

素察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二十几年岁月当中，大部分时间不是用来为中国人民服务，而是用来研究泰族历史的本来面目，以表达他所具有的强烈爱国热情。他表达这种爱国情怀，并不需要站到马路中间向(泰国)国旗立正致敬。

为人生出版社为能够把这本书介绍给读者而感到自豪。这可能引起我们历史学界的某些矛盾，但只要读者用公正的态度来读这本书，那就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素察·蒲媚波里叻所写的这本书，不仅在历史方面有其价值，而且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思想水平。

我说素察·蒲媚波里叻是一个“我们所需要的人”，大概不会错吧。

1982年6月1日

〔注释〕

- ① 1951年6月29日，美国送给泰国一艘“孟哈顿”挖泥船，在移交仪式上，以海军少校玛纳·乍鲁帕为首的一群武装水兵劫走了当时的泰国总理波·披汶颂堪元帅，进行政变，但结果遭到失败。——译者
- ② 佛陀在世时期称佛劫期，一个佛劫期是5,000年，半个佛劫期是佛历2,500年，也即是公元1957年。——译者
- ③ 系北京师范学院之误。——译者

南诏是我们 泰族的国家吗？

记得几个月前，坤猜克立·巴莫^①曾经在《沙炎叻日报》上译载过杜玉亭和陈吕范的《忽必烈平大理(大理府*)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》一文，后来，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还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。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，应该进一步加以探讨，因为这是个相当隐晦复杂，并且涉及到南诏国的历史的问题。几乎每一本泰国历史书籍，都认为南诏和大理府是泰族建立的国家，但这种说法正被中国古代的史实所推翻。

二十年前，当我刚刚到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，听到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在谈到南诏的历史时说，南诏国和大理府国是“乌蛮”(现在的彝族)和“白蛮”(现在的白族)所建立的国家，而不是泰族所建立时，便感到莫名其妙，因为自从我念小学、中学时起，便被教知说，南诏是泰族的国家，这种观念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于是我向这位历史学家提问道，“那么泰族原来的国家究竟在哪里呢？”回答是：“按照中国的史料，譬如《扶南异物志》

* 原文如此。

和《吴时外国传》^②都记载说，大约在公元前230年，泰族原来的国家就已经在现在泰国的这块土地上了。”我又问道，“那么西双版纳的泰族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他说：“是从南方迁来的，他们自称为‘傣’”。这就更使我感到疑惑不解，尽管对方列举了许多理由和根据对这种说法进行解说，但我心里仍然不信。

泰族不是南诏国和大理府国的创建者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。

我重新查阅了几本泰国的历史书籍，便感到所谓泰族是南诏国和大理府国的创建者的说法，缺乏充分的理由和根据，有些描述简直有如神话一般。于是我便转而去研究中国的史料，因为我认为只有用公正的态度去进行缜密的研究，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或者比较正确的历史结论来。

我不是历史学家，而只是对历史感到兴趣。不过我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沾染上轻率造次、囫圇吞枣和抄袭他人的习惯。一个好的历史学家，应该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因为正确的历史结论本身，要求历史学家具备这样的态度。

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历史资料，考察历史文物和分析一个民族或一个部族的语言、衣着服饰及其家族关系、婚丧仪式等传统习惯；尤其是语言方面，应着重进行分析，因为“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性。”另一方面，还必须考察一个民族或一个部族的迁徙情况，看看他们迁徙到了什么地方，后来他们又转化成别的什么民族或部族。如能做到这些，那么他所写的历史书籍才是可信的，也经得住任何的检验。

每当我打开泰国历史书籍进行阅读，便感到不寒而栗，因

为其中阐述的种种理由和根据，竟然与那些殖民主义者的论调毫无不同之处。著书宣扬泰族是南诏国的创建者的外国人有好几个，如用法国姓名的英国人拉古伯里(Terrien de Lacouperie)，写了《掸族发源地》；法国人艾·罗歇(E. Rocher)写了《中国的云南省》和《云南史》；英国人亨·理·戴维斯(H. R. Davies)写了《云南——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》；英国人吴迪(W. A. R. Wood)写了《暹罗史》；美国牧师威·克·杜德(W. C. Dodd)写了《傣族》；德国人威·克勒纳(W. Credner)写了《同南诏国有关的大理文化、地理考察记》；日本人铃木俊写了《以南诏为中心的各少数民族》等等。

把这些历史书籍拿来拂去灰尘，读它两、三本，便可马上嗅出那有意歪曲南诏和大理府历史的殖民主义的味道来。

在十九世纪，拉古伯里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，显然以“中国通”自居。

关于南诏国，拉古伯里在《掸族发源地》一书中写道，在西南方，有一个国王称蒙国大昭。“蒙”是泰族的姓氏，而南诏的统治者姓蒙，这在《尔雅》^③一书中是说得明明白白的……。这不知是出于误会还是有意歪曲历史，因为拉古伯里所提到的《尔雅》一书，写于公元前五百多年（有的历史学家说是写于秦末或汉初），但是南诏国，如果连蒙舍诏也算在内，则建立于公元649年，两者相距一千多年，因此怎么能说《尔雅》一书中的“蒙国大昭”，就是南诏的国王呢？

在另一处，拉古伯里依据古籍《书经》^④中所说的，汤王（商朝的开国皇帝）打败了夏朝的最后一个皇帝，然后把他放逐到南朝去……，便说“南朝”就是南诏！其实，南朝位于现在

的安徽省，而且夏朝的末代皇帝被放逐到南朝去是在公元前1766年，距离南诏国建立的时间二千四百余年，真是风马牛不相及，可是吴迪先生等人却偏以此作为书写有关泰族史籍的根据。

吴迪先生在《暹罗史》一书中写道，“公元1253年，南诏（或云南）被忽必烈所征服，这个泰族的国家因此便最后完结，并导致该国人民的大批向南迁移，正如后来所见到的，这对暹罗的历史带来重大的影响。”

戴维斯先生在《云南——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》一书中写道，“自从公元十三世纪中国的蒙古皇帝征服云南之后，那些没有被汉族同化的掸族，便逐渐被赶向南方，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。”

杜德牧师在《傣族》一书中写道，“泰族第七次，也就是最后一次从中国向南大量迁移的浪潮，是在公元1234年大理府的哀牢国被消灭之后发生的。这个国家曾经存在了六百多年。”

由于上述这些书籍的影响，使得我们泰国人民至少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，便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认识产生混乱。我也一直认为泰族的先民是南诏国家的创建者，并且是对此深信不疑的人当中的一个，只是在对史料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探讨之后，才觉得“南诏国”存在一些值得怀疑的问题。后来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，有关南诏的一些重大问题，才逐渐明白起来。自从一千多年前及其后来的时期里，中国的学者便记载了许多有关南诏的事情，例如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中的《西南夷传》、《唐书》中的《南诏传》和《南蛮传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唐会要》、

《元史·地理志》、《南诏德化碑》^⑤等等，都是在研讨有关南诏问题时值得参考的历史资料。

有一次，我到云南省的昆明市去，有机会同徐家瑞、陈可大、缪鸾和、张凤岐等几位中国历史学家进行交谈，他们都是专门从事研究少数民族、包括傣族的历史的专家。从三天的交谈中，使我对南诏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历史文献表明，南诏于公元794年建成一个完整的国家，存在了一百零八年，到公元902年便瓦解了，随后建立的国家存在的时间都很短，其统治者有郑、杨、段等姓氏，他们是汉族人、“乌蛮”人和“白蛮”人。到了公元937年，段氏就建立了大理国（泰国史籍称为大理府）。该国存在了三百一十六年，便于公元1253年被蒙古军队所征服。中国的历史文献清楚地表明，蒙古军队征服大理国主要是用和平方式，即用武力包围，然后进行谈判，最后议定让大理国主及其各地的统治者仍旧维持原职，但须归附于元朝。因此，没有发生云南境内的任何民族“大批”向南迁移这样的事情。这段情节，坤猜克立已经在《沙炎叻日报》上译载过，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

在南诏国建立以前，在这同一块土地上，曾经建立过几个小的国家，如昆明国、滇国、白子国、建宁国等，后来又出现了六诏。在把这六个诏统一之后，才建立起南诏国。为了整个历史的连贯性以及更好地了解南诏的形成，我想有必要先扼要地谈一谈这些小国的情况。

在现今云南省的土地上，成千上万年以前就曾经居住着许多民族和部落。这些民族和部落，都有自己历史的古老传说，不过这些传说不能作为历史的依据。

有文字记载的史料，在西汉伟大的历史学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（公元前135—前93年）所著的《史记》^⑥一书中可以找到。司马迁曾经亲自到昆明国进行过采访，因此他的著作应该可以作为论据。

昆明国大约建于公元前900年，以洱海地区为中心，北抵松外蛮（在今永胜县地区），东接弄栋川（在今姚安县），南至蒙舍川（在今巍山县），西濒西洱河。她是由“白蛮”、“乌蛮”和其他六、七个“蛮”的民族所构成。这都是根据从滇国国王的陵墓中挖掘出来的铜像、铜鼓等文物考证出来的。这些文物上铸有人像约二百多个，从这些人像的发型和服饰上，大致可辨认出八个民族。因此可以说，在昆明国时期，其民族构成同滇国时期大体上不会有多大的差别。

昆明国的真正性质，只不过是已经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和部族的部落联盟。人们的生活状况，是处于正在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原始公社时期，国家政权没有完全形成，所以还称不上是一个国家。

马长寿在他的《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》一书中，认为“白蛮”是昆明国的创建者，因为她是昆明国的大民族，具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文化。他列举了下面这些材料作为依据：

（一）“白蛮”已经使用“爨文”，其字形同汉文相似，个别字的发音也相同，但大多数的字仍按“白蛮”语发音。在现在出土的文物中，还可看到不少的爨文；

（二）《新唐书》中的《南蛮传》记载古代昆明人的发型和服饰说：“人辫首左衽”；